南京人更“仇日”吗：“南京大屠杀”背景下网络评论影响群际宽恕的地区差异

张田[1]，孙卉[2]

（1. 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4；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南京，210013）

摘　要：为探讨网络评论影响群际宽恕的地区差异，本研究基于“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背景，选取了来自六个城市的 152 名市民参与此次研究，研究中让被试阅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和虚拟的网络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填写群际宽恕问卷。结果显示：（1）网络评论的方向性能够显著影响新闻报道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2）网络评论对于群际宽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即对于非南京市民而言，当评论的方向为正向时，其群际宽恕水平也相对更高，反之则更低；对于南京市民而言，无论评论的方向性如何，其群际宽恕水平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3）与外国群体相比，中国被试的群际宽恕水平更低。这种地区的差异可能源于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文化的差异、政治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群际宽恕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关注文化背景、测量工具、干预模式等领域。

关键词：网络评论；群际宽恕；地区差异

1　引言

对中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外群体侵犯之一，其中又以“南京大屠杀”事件最为典型。然而，我们在谴责军国主义的同时，也应将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所说，“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对于当代中国人，能否如总书记所言不因个别军国主义分子而仇视日本民族，宽容地对待日本人民？这涉及宽恕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群体宽恕（Intergroup Forgiveness）。

群际宽恕指的是群体成员对曾经侵犯过本群体的外群体所具有的报复感、愤怒感以及不信任感的减少，有意识地去理解、接近对方群体并积极地参与到对方群体中去的一种群体心理过程（Staub，2006；Tam，Hewstone，Cairns，Tausch，Maio，& Kenworthy，2007；Cehajic，Brown，& Castano，2008）。该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有学者将这些因素归纳为群体认

知（例如内群偏向性认知、低人性化认知等）、群体情感（例如群体愤怒、群体共情等）、群体行为（例如道歉行为、群体接触等）三个方面（艾娟，2014）。

除此之外，有研究显示，媒体报道对于群体间矛盾的化解或加深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面对当前的医患矛盾问题，如果新闻报道展现的是医务工作者的正面形象，则有助于提高大众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程度；相反，如果媒体报道的是医务工作者的负面形象，大众对于医院和医生的信任程度则会大大降低，进而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汪新建，王骥，2017）。因此，体现群体间矛盾的群际宽恕是否同样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

但相比于媒体报道本身，有研究显示，针对该报道的网络在线评论对读者看法的影响更大（Ahn，2011；Lee & Jang，2010）。Kim 和 Rhee（2005）的研究就显示，读者更倾向于通过阅读在线评论来判断舆论的方向，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对于在线评论，Lim 和 Heide（2014）认为其具有方向性的特征，并将其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向；韩国学者的研究则进一步将在线评论的方向性分为支持、不支持、中立三种方向类型（Kim & Kim，2005）。故此，本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就是针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新闻报道的在线评论的方向性是否会影响新闻报道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

此外，面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有人认为深受该事件影响的南京市民理应更仇视日本，即群际宽恕的水平更低。然而，网络上一段“日本女孩在南京街头求助”的视频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视频中，一名日本女孩到南京旅游，她原本担心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而受到南京市民的排斥，然而当她在南京街头向路人求助时，却得到了很多南京市民的热心帮助，视频中一位南京市民对女孩说：“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讲道理的，那（指‘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过去的事，跟日本人民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本研究的另一关注点即在“南京大屠杀”事件背景下，南京市民对于日本的群际宽恕水平与非南京市民是否有差异。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街头随机取样的方法，研究组在商场、住宅小区、咖啡馆等地点随机选取被试。首先，询问选取对象是否愿意参与此次调查，当得到肯定答复后，向其确认是否知晓“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如果选取对象表示知晓该事件，即成为本研究的被试。

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街头取样，研究组在南京、上海、西安、武汉、济南、苏州等地共选取 183 人，其中有效被试 152 人，包括男性 66 人，女性 86 人；南京市民 72 人，非南京市民 80 人（以户籍所在地是否为南京作为区分标准，不包括临时户籍或单位集体户籍）。被试

年龄分布在 17 岁~7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2.03±12.36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新闻报道及网络评论材料

为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本研究选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官方微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发布的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下，本研究虚拟了几条关于该报道的网络评论。赖胜强和朱敏（2009）的研究显示，当两条或两条以上网络评论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评论所表达的信息可以相互印证时，此时信息传播效果要好于单一评论信息，并且该类信息的可信度也更高。因此，本研究在每种评论的方向性特征条件下，均虚拟了三条网络评论，其中积极方向的评论包括“战争的罪恶在法西斯，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等，中性方向的评论包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等，消极方向的评论包括“日本人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等。

2.2.2 群际宽恕问卷

本研究选取了 Moeschberger 等人在研究北爱尔兰民族冲突的群际宽恕问题时所编制的群际宽恕问卷（Moeschberger，Dixon，Niens，& Cairns，2005），并在研究中将原始问卷所涉及了群际冲突背景改成了“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该问卷包含 7 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 1~5 分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同意”，“5”表示“完全不同意”。将其中四道反向计分的题目进行反向计分后，所有题目的总分越高，表示被试的群际宽恕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

2.3 研究设计与研究流程

本研究是一个 3×2 的被试间设计，自变量分别是网络评论的方向性（积极、中性、消极）和被试是否为南京市民（是、否），因变量为被试的群际宽恕水平，即被试填写群际宽恕问卷的得分。

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为确保“网络评论的方向性”这一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邀请 50 名大学生对 9 条虚拟的网络评论（积极、中性、消极评论各 3 条）所表达出的方向性用 0~10 这 11 个数字评分，其中“0”表示完全消极、负向，“10”表示完全积极、正向。在确定该自变量的有效性后开始正式实验，即通过街头取样确定被试后，首先向其介绍研究的具体要求，然后根据户籍所在地的标准，确定其是否为南京市民。在此基础上，向被试发放新闻报道及关于该报道的虚拟网络评论截图，每位被试仅随机阅读一种方向性的网络评论。待被试阅读完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后，向其发放群际宽恕问卷，问卷当场填写并回收。最后向被试赠送小纪念品表示感谢。

3 研究结果

3.1 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检验

如前文所述，为确保“网络评论的方向性”这一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邀请 50 名大学生对 9 条虚拟的网络评论所表达出的群际宽恕程度用 0~10 这 11 个数字评分，其中“0”表示完全消极、负向，“10”表示完全积极、正向。结果显示，每种方向性特征条件下的三条评论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F_{积极}$=1.50，$p_{积极}$=0.233；$F_{中性}$=0.49，$p_{中性}$=0.619；$F_{消极}$=1.26，$p_{消极}$=0.292）。此后，计算每种方向性特征条件下三条评论的平均得分，在此基础上比较三种方向性特征条件平均分的差异，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_{平均分}$=452.99，$p_{平均分}$=0.000），进一步事后检验显示，积极评论的平均分显著高于中性和消极评论，而中性评论的平均分也显著高于消极评论。这些结果表明，对于“网络评论的方向性”这一自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3.2 被试同质性检验

本研究为 3×2 的被试间设计，故有 6 种研究处理。为保证接受处理之前的各组被试是同质的，首先对各组被试进行同质性检验。同质性检验的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其中六个组的被试在年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_{年龄}$=0.83，$p_{年龄}$=0.529），在性别分布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chi_{性别}^2$=2.85，$p_{性别}$=0.723）。

表 1 被试同质性检验数据

	积极评论		中性评论		消极评论	
	南京（*N*=24）	非南京（*N*=29）	南京（*N*=24）	非南京（*N*=27）	南京（*N*=24）	非南京（*N*=24）
年龄（*M*±*SD*）	29.83±12.86	31.72±14.81	30.54±09.62	31.00±11.15	33.13±11.59	36.17±13.26
性别人数（男/女）	11/13	9/20	11/13	11/16	12/12	12/12

注：年龄单位“周岁”

3.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六种处理条件下因变量的平均数与标准差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积极评论（*N*=53）	中性评论（*N*=51）	消极评论（*N*=48）
南京市民	21.58±8.40（*N*=24）	20.50±6.97（*N*=24）	20.00±6.42（*N*=24）

非南京市民	22.83±6.32（N=29）	18.52±6.76（N=27）	13.71±7.89（N=24）

3.4 自变量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以网络评论的方向性和被试是否为南京市民为自变量，群际宽恕问卷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网络评论的方向性的主效应显著（$F_{评论方向性}$=7.06，$p_{评论方向性}$=0.001），是否为南京市民的主效应显著（$F_{地区}$=4.08，$p_{地区}$=0.045），两者的交互效应显著（$F_{交互效应}$=3.51，$p_{交互效应}$=0.032）。

结合图 1 和基于 Bonferroni 校正的简单效应检验可知，对于南京市民而言，群际宽恕水平并不受到网络评论方向性的显著影响(p＞0.05)，且稳定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对于非南京市民而言，网络评论的方向性会显著影响其群际宽恕水平，具体而言，非南京市民在积极评论条件下的群际宽恕水平与其他两种评论条件的差异达到或接近显著性水平（$p_{积极-中性}$=0.076；$p_{积极-消极}$=0.000）；非南京市民在中性评论条件下的群际宽恕水平与消极评论条件下的差异也接近显著性水平（$p_{中性-消极}$=0.052）。简言之，当网络评论方向从积极转为消极时，非南京市民的群际宽恕水平也随之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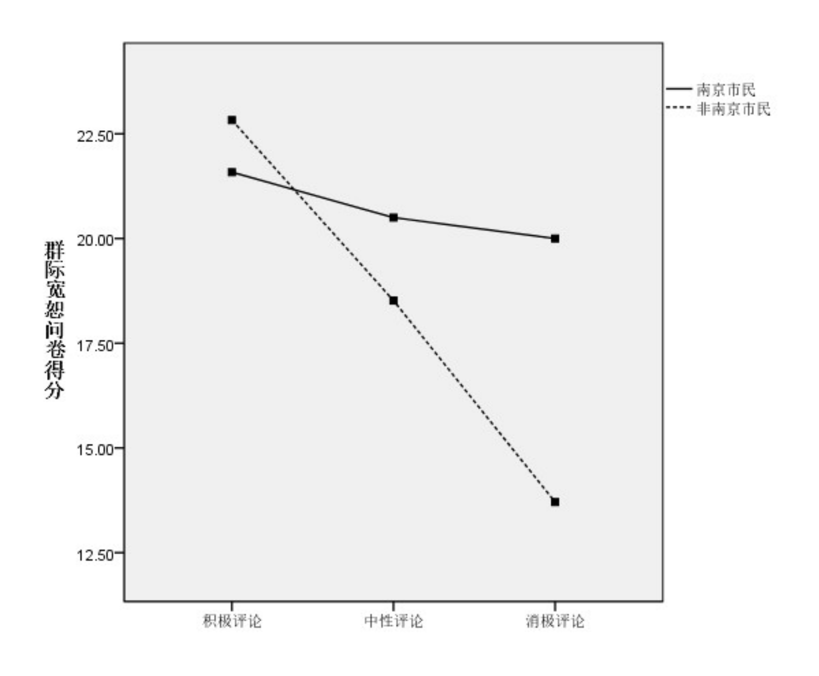


图 1 交互效应分析图

3.5 与其他群体群际宽恕水平的比较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群体的群际宽恕水平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同时控制网络评论方向性的

影响，将本研究中“中性评论”条件下的数据与 Leonard 等人的研究数据进行对比，在该研究种，研究者使用了与本研究相同的群际宽恕问卷，研究对象涉及穆斯林、天主教、东正教等不同宗教群体（Leonard，Damjanovic，Simic，& Marshall，2018）。单样本平均数差异分析显示，即使与该研究中群际宽恕水平最低的穆斯林群体（M=22.75，SD=6.10）相比，本研究“中性评论”条件下被试的群际宽恕水平（M=19.45，SD=6.86，N=51）也显著更低（t=-3.43，p=0.001）。

4　讨论

4.1　网络评论影响群际宽恕的地区差异

研究发现，网络评论的方向性对于新闻报道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即当网络在线评论的方向为正向时，新闻报道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也相对更高；反之，当评论方向为负向时，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也随之降低。正如 Yang（2008）的研究所言，网络评论对于读者影响甚至比新闻报道本身更大。此外，当评论方向为正向时，不同地区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差异不大，但当评论方向为中性或负向，尤其是负向时，不同地区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则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国内外的研究都指出，新闻报道的读者在阅读网络评论时，更关注负向或消极方向的评论内容，并基于此来形成自己对于该新闻报道的观点（Zhang，Zhao，Cheung，& Lee，2014；郝龙，王志章，201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群体为何在负向评论条件下会出现显著的差异。

同时，网络评论的方向对于新闻报道读者群际宽恕水平的影响还存在地区的差异。结合图 1 可以发现，对于非南京市民而言，网络评论方向性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当评论的方向为正向时，读者的群际宽恕水平也相对更高，反之则更低。然而，对于南京市民而言，这种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即无论评论的方向性如何，南京市民的群际宽恕水平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与人们认为的“南京人应该更加仇日”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张连红（2003）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该研究发现，即使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其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多的也是宽容。究其原因，可能源于南京市民对于“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有着更加理性的认识。有关群际宽恕的研究发现，如果群体之间能够相互接触、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理性认知侵犯事件，被侵犯群体对于侵犯群体的消极感知会明显降低，同时增加对侵犯群体的多样化认知，由此分解对整个外群体形成的负向情感，促进群体宽恕的产生（Hewstone，Cairns，Voci，Hamberger，& Niens，2006；Paladino，Vaes，Castano，Demoulin，& Leyens，2004）。南京每年会围绕“南京大屠杀”举办各种活动，其中尤以每年 12 月 13 日

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最为典型。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南京市民对于“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正如前文所述视频中南京市民所言：“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讲道理的，那是过去的事，跟日本人民是没有关系的。”

4.2　中外群际宽恕水平的差异

本研究还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中国人的群际宽恕水平相对更低一些。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例如 Hanke 等人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比较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法国、俄罗斯、波兰等六个欧亚国家或地区被试群际宽恕的差异，结果也显示中国大陆地区被试的群际宽恕水平是最低的（Hanke，Liu，Hilton，Bilewicz，Garber，& Huang，2013）。这一方面可能源于文化的差异，东方文化背景下，宽恕更强调的是人际或群体关系的改善，而西方文化则强调自身体验的积极改变（Kadiangandu，Mélanie，Geneviève，& Mullet，2007；张田，孙卉，傅安球，2012），因此对于中国群体而言，当双方关系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时，群际宽恕的水平也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中国被试的低群际宽恕水平也可能源于政治因素，因为道歉是促进群际宽恕的重要因素（张田，2019），然而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极右翼势力对于战争持有错误的言论和态度，这可能是造成中国群体群际宽恕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从网络评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群际宽恕的地区差异。回顾整个研究，有两个方面还值得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除了方向性特征，网络评论还具有其他一些特征，例如 Filieri（2015）指出，网络评论还具有内容性质的特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评论往往更令人信服，而基于主观情绪宣泄的评论则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Park & Kim，2008）。因此，没有从多维度出发考察网络评论对于群际宽恕的影响，此乃本研究的局限之一。另一方面，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取样城市也仅有六个，样本的代表性有待提升。

群际宽恕是宽恕研究的新兴领域，研究除了从多维度考察网络评论的作用，以及提升样本的代表性以外，后续研究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关注该领域：

第一，丰富研究的文化背景。当前，群际宽恕研究的文化背景比较单一，已有的群际宽恕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背景，例如二战受害国对于德国的群际宽恕（Stathi，Husnu，& Pendleton，2017）、波黑地区的民族矛盾（Leonard，Damjanovic，Simic，& Marshall，2018）等。然而，宽恕具有很强的文化特质，在东西方文化中有较大差异（张田等，2012），因此西方研究的结论很难直接推论到东方文化中，本研究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开展群际宽恕的研究是今后研究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

第二，完善研究的测量工具。当前群际宽恕的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测量的形式开展，但与个体人际层面的宽恕测量已有较多、较成熟的问卷不同，群际宽恕领域的测量工具尚不多，且内容和层次较为简单，甚至有研究仅仅通过一道题来测查被试的群际宽恕水平（Okimoto，Hornsey，& Wenzel，2019）。此外，已有的群际宽恕问卷往往带有较强的情境性，很难跨情境应用。因此，开发与完善群际宽恕的测量工具亦是今后研究的内容之一。

第三，开发干预的方法模式。绝大多数群际宽恕的研究都认为，群际宽恕有助于缓解冲突双方的矛盾，因此研究者们也关注到了群际宽恕的干预提升。然而，群际宽恕的干预尚处于探索阶段，例如帮助双方更好地认识冲突带来的伤害，促进宽恕的发生（Staub，2006；Nadler & Shnabel，2011）；通过相应的组织在群体水平上对宽恕的进程积极介入（Cehajic，Brown，& Castano，2008）；通过相关的教育或者活动增加群体间的接触以及对外群体的多样性认识（McGlynn，Niens，Cairns，& Hewstone，2004）等。但总体而言，这些实践没有形成系统的模式。此外，为数不多的干预实践集中于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矛盾，群体成员接触较多，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调控。但是国家间的冲突则带有更多政治色彩，民众相互接触的机会少，因此不同国家间群际宽恕干预的方法值得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艾娟. (2014). 群际宽恕的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 22*(3), 522–529.

郝龙, 王志章. (2018). 互联网负面新闻偏好对患方信任的影响——基于网络新闻大数据与 CSS2013 的实证研究. *学术论坛, 4*, 38-47.

赖胜强, 朱敏. (2009). 网络口碑研究述评. 财贸经济, (6), 127-131.

汪新建, 王骥. (2017). 媒体中的医方形象及其对医患信任的影响.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6(2), 99-104.

张田, 傅宏. “对不起”有用吗: 道歉对群际宽恕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7*(01), 121-127.

张田, 孙卉, 傅安球. (2012). 集体主义背景下的宽恕研究及其对心理治疗的启示. *心理科学进展, 20*(2), 265-273.

Ahn, H. (2011). The effect of online news story comments on other readers' attitudes: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incongruence between news tone and comments.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Cehajic, S., Brown, R., & Castano, E. (2008). Forgive and forge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group forgivenes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Political Psychology, 29*(3), 351-367.

Claire, M. G., Niens, U., Cairns, E., & Hewstone, M. (2004). Moving out of conflict: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grated schools in Northern Ireland to identity, attitudes,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Journal of Peace Education,*

1(2), 147-163.

Filieri, R. (2015). What makes online reviews helpful? A diagnosticity-adoption framework to explain informational and normative influences in e-wom.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8*(6), 1261-1270.

Hanke, K., Liu, J. H., Hilton, D. J., Bilewicz, M., Garber, I., & Huang, L. L., et al. (2013). When the past haunts the present: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nd historical closure in post world war ii societies in Asia and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7*(3), 287-301.

Hewstone, M., Cairns, E., Voci, A., Hamberger, J., & Niens, U. (2006). Intergroup contact, forgiveness, and experience of "the troubles" in Northern Ireland.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2*(1), 99-120.

Kadiangandu, J. K., Mélanie, G., Geneviève, V., & Mullet, E. (2007). Conceptualizations of forgiveness: collectivist-congolese versus individualist-french viewpoints. *European Psychologist, 9*(4), 78-86.

Kim, E., & Rhee, J. (2005). Rethinking "reading" online: The effect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50*(4), 65-94.

Kim, K., & Kim, J. (2005). Analyzing readers' comments in Internet newspaper Ohmynews. *Korea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 Studies, 19*(3), 7-40.

Lee, E. J., & Jang, Y. J. (2010). What do others' reactions to news on internet portal sites tell us? Effects of presentation format and readers' need for cognition on reality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6), 825-846.

Leonard, M. A., Damjanovic, B., Simic, G., & Marshall, G. A. (2018). Peace building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ffects of ingroup identification, outgroup trust and intergroup forgiveness on intergroup contact.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3*(1), 29-58

Lim, Y. S., & Heide, B. V. D. (2014). Evaluating the wisdom of strangers: the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yel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 67–82.

Moeschberger, S. L., Dixon, D. N., Niens, U., & Cairns, E. (2005). Forgiveness in northern Ireland: a model for peace in the midst of the "trouble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1*(2), 199-214.

Nadler, A., & Shnabel, N. (2011). Promoting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in conflicts involving direct and structural violence: Implications of the Needs-Based Model. In L. R. Tropp & R. Mallett (Eds). *Moving Beyond Prejudice Reduction: Pathways to Positive Intergroup Relations* (pp.201-219). New York: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kimoto, T. G., Hornsey, M. J., & Wenzel, M. (2019). The power of grassroots expressions of remorse for promoting intergroup forgive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0*(1), 9-51.

Paladino, M. P., Vaes, J., Castano, E., Demoulin, S., & Leyens, J. P. (2004). Emotional infra-humanization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The role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attribu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motions to Italians and Germans. *Current Psychology of Cognition, 22*(4), 519–536.

Park, D. H., & Kim, S. (2008). The Effects of Consumer Knowledge on Message Processing of Electronic Word-of-mouth Via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7*(4), 399-411.

Stathi, S., Husnu, S., & Pendleton, S. (2017). Intergroup contact and contact norms as predictors of postconflict forgiveness.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1*(1). 20-39

Staub, E. (2006). Reconciliation after genocide, mass killing, or intractable conflict: Understanding the roots of violenc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and step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27*(6), 867–894.

Tam, T., Hewstone, M., Cairns, E., Tausch, N., Maio, G., & Kenworthy, J. (2007). The impact of intergroup emotions on forgiveness in Northern Ireland.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0*(1), 119–136.

Yang, H. (2008). The effects of the opinion and quality of user postings on Internet news readers' attitude toward the news issue. *The Korean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52*(2), 254-281.

Zhang, K. Z. K., Zhao, S. J., Cheung, C. M. K., & Lee, M. K. O. (2014).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reviews on consumers' decision-making: a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67*(C), 78-89.

Do Nanjing citizens hate Japanese mor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s of online comments to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s of online comments to intergroup forgiveness, 152 citizens from six citi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anking Massacre*. In the study,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read a reportage about *Nanking Massacre* and its online comments, then to complete an intergroup forgiveness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direction of online comments did affect the audiences' intergroup forgiveness. (2) There were som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s of online comments to intergroup forgiveness. To Nanjing citizens, whatever the direction of online comments, the intergroup forgiveness was always kept in a high level; To the other citizens, a positive online comment corresponded to a high level of intergroup forgiveness, while a negative comment corresponded to a low level. (3) The level of Chinese's intergroup forgiveness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people

from other regions. These differences may have the root in the different view to the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r in the political issues. Finally, the future studies about intergroup forgivenes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the measuring tools, and to the intervention models.

Key words: online comment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tergroup forgiveness